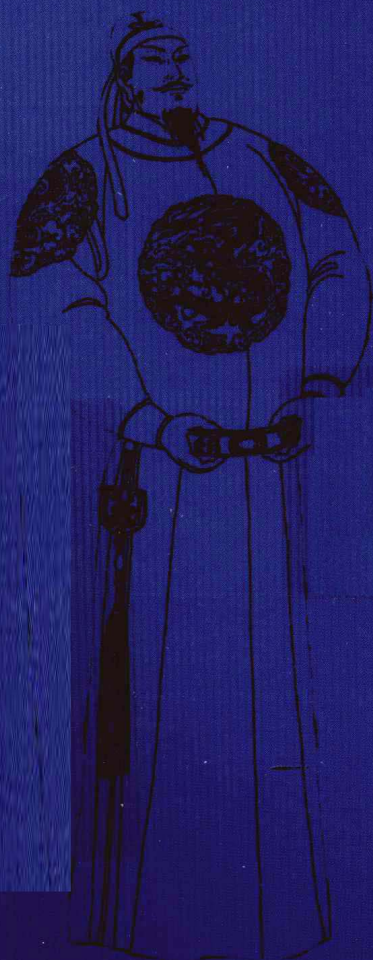


新解

贞观政要

治国为政要览

李凤飞 张大生 编著



西苑出版社

新解

贞观政要

李凤飞 张大生 编著

治国为政要览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贞观政要/李凤飞,张大生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2010.5

(新解)

ISBN 978 - 7 - 80210 - 723 - 6

I. ①贞… II. ①李… ②张… III. ①典章制度 - 中国 - 唐代
②贞观政要 - 注释③贞观政要 - 译文 IV. ①D6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6739 号

新解——贞观政要

编 著 李凤飞 张大生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 - 88624971

传 真:010 - 88637120

网 址 www. xycbs. com

E - mail: xycbs8@126. 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0 - 723 - 6

定 价 23.5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贞观政要》与民本思想新解

舟、鱼与水之关系	3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5
贵顺物情	6
“割股啖腹”说	8
张玄素的论据	10
李世民吃蔬菜素食	13
弓 喻	15

第二章 《贞观政要》与廉洁从政新解

爱 财	21
“常惧”论	23
戒 奢	24
防微杜渐	27
钓 饵	29
“外助”问题	31



第三章 《贞观政要》与广开言路新解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35
“镜”说	36
态度问题	39
“没意见”心理种种	42
魏征的实话	45

第四章 《贞观政要》与重才思想新解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49
何以辨“堪否”	51
论“德才”	54
六正、六邪.....	57
“马周”问题	60
说“长”道“短”	63
封德彝目中无人	66

第五章 《贞观政要》与管理方略新解

何止“十羊九牧”	71
不疑、不蔽、不私	72
礼下与辱下	75
拜谢什么	78

制衡机制与监督意识	80
赏善罚恶	83
重视地方干部	86

第六章 《贞观政要》与依法治国新解

“刑赏”别论	91
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93
张蕴古之死	94
杨誉竞婢	97
贾崇案的反思	99
程序问题	101

第七章 《贞观政要》与决策艺术新解

日理万机,干纲独断	107
令出惟行	110
重在“谋势”	111
房谋杜断	113
略谈“力排众议”	116
渭水桥头	119

第八章 《贞观政要》与以德治国新解

诚信论	125
-----------	-----



戴胄断案·····	127
豫让之见·····	129
君子与小人的分野·····	132
皇叔之怨·····	134
带刀入阁风波·····	137
魏征辩诬·····	139

第九章 《贞观政要》与学习型组织建设新解

太宗谈读书·····	145
文“化”人·····	148
慎出文集·····	150
不务虚名·····	153
赵元楷其人·····	155
不做“三旨相公”·····	157

第十章 《贞观政要》与自我修为新解

提升十思论·····	163
金玉论·····	165
齐桓公现象·····	167
谦虚简论·····	170
“自知”与“知人”·····	173
推动臣下·····	175
慎言语·····	177



第十一章 《贞观政要》与以史为鉴新解

洁 本·····	183
说“自传”·····	185
触景生情·····	188
错 位·····	190
走出沼泽地·····	192
“古”鉴·····	195
创业与守成·····	198

第一章

《贞观政要》
与民本思想新解

1

贞
观
政
要

舟、鱼与水之关系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政体》

粗读《贞观政要》，有关舟水关系的论述，主要有两处：一在《政体》，一在《君臣鉴戒》；一在贞观六年，一在贞观十四年；一为“古语云”，一为“孙卿子曰”。两处均见于魏征给唐王的奏折中，引文大致差不多。意思也较为浅显：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当然，这个意思，在魏征的《十思疏》中也有表述：“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之为“舟水关系”，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一些有识之士朴素的民本思想。孙卿子（即荀况）是战国时人，比他更早一些的春秋时代的齐国政治家管仲曾经作过更为准确的描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不知这是否荀子“舟水理论”的思想嚆矢。

李世民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乱世”中夺得政权的，他亲眼目睹了民众在改朝换代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巨大威力，从而深深地产生了对此种伟力由衷的敬畏。魏征作为同一时期另一股政治力量帐下的幕僚，当然也懂得这层道理。这就是在隋末唐初这个特定时期，这个话题被反复提及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因素。

“舟水之论”反映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能看到二者之间的统一性（依赖、互动），这固然体现了中国早期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睿智。然而，从阶级本质和经济基础来看，这种“舟水关系”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的倒是它的对立性质。这就是前贤先哲总在“载”与“覆”上作文章的思想底蕴。

苍狗白云，斗转星移。同样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1300多年后的今

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社会分工而言,尽管仍然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野,但是从根本上说,已经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在这个社会里,原则上说来,官员与公民,干部与群众,尽管在哲学上仍然是对立统一关系,但矛盾的根本性质和主导方面,主要体现在统一这个层次。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个非常通俗的表述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然还有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等种种说法。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新时代的干群关系,应当是彼此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而不至于出现“覆舟”关系。梁衡的散文《红毛线,蓝毛线》描述了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他说,在战争时期,党和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鱼水关系。“西柏坡坡下有水,有稻田,毛泽东是从小干惯了稻田活的,工作之余就挽起裤腿去和农民插秧。朱老总一脸敦厚,在村头背着手散步,常被误认为是下地回来的老乡。任弼时全家人睡的土炕上至今还放着一辆纺车。领袖们走过雪山草地,大都到过东洋西洋,他们统率千军万马,熟悉中国的经济,遍读经史子集和马恩列斯,他们知识渊如海,业绩高如山,但是他们却这样自自然然地溶在革命队伍中,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分子。”

其实,鱼水关系,并非今人的创造,能够查到的根据仍是《贞观政要》。在《君臣鉴戒》一章中,有魏征引孔子的一句话:“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不过,这个比喻的深层含义并非是说皇帝与平民具有什么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它所揭示的道理在于,“鱼”离开了水就是死路一条,而水仍然还是水。这与“舟”可能的“载”与“覆”都不可能改变水的地位与性质是一样的。这似乎是对一种不可知力的恐惧,也正好说明旧时开明君臣对人民的伟大力量的油然敬畏。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辨兴亡》

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对时为黄门侍郎的王圭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很多百姓都饥饿困乏。虽然国家的粮仓很满，杨坚竟不允许开仓救济，却让百姓逃荒到有粮食的地方自己找饭吃。隋文帝不爱百姓只惜仓库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到他死的时候，国家储积的粮食，竟可以供给全国的百姓吃五六十年……凡是治理国家的，务必积蓄于民，而不在于装满国家的仓库。古语云：‘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国君的用度怎么会够？’”后面这句“古语云”，出自于《论语·颜渊》，是圣徒有若先生回答鲁哀公的话。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个思想也不仅仅属于有若先生，当然更不属于李世民。如果将这个思想通俗化为“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的话，那么，在庄子则有“江河合水而为大”；在荀子则有“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墨子则有“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在李斯则有“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后汉书》则有“涓流虽寡，浸成江河”。这里有许世友将军的一则故事：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最后一次回故乡看望当时衣着褴褛、年过七旬的老母亲。离家之前，当地的党政官员请他谈谈对家乡的感想和要求。他板着黑沉沉的脸说：“连老祖宗都知道，民富才能国强……你们说什么‘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大河里无水小河里干’，糊涂虫，应该颠倒过来，

‘小河里有水大河里满，小河里无水大河里干’。”有人轻声反驳：“我们是讲锅里有，碗里才有。”“锅里有？锅里的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老百姓碗里挖来的，咱们共产党，从什么时候学会了自己骗自己？不要为了邀功升官，坑害百姓！”这就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高风亮节。在这一点上，“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才得到了正确而深刻的诠释。

贵顺物情

贞观元年，太宗谓使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

——《俭约》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对待臣说：“自古以来，帝王们凡是要兴建工程，必须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开凿九山，浚通九河，耗费人力非常巨大，却没有人痛恨埋怨，因为民心希望这样做，他集中了百姓的意愿。秦始皇营造宫室，人们常常指责批评，因为他是为了满足私欲，与民心不一致的缘故。”在这段对话中，所反映的思想，至今看来，也还是有价值的，那就是对“贵顺物情”有意或无意的崇尚和追求。“物情”也者，据《辞源》解释1. 物理人情。2. 众望，人心归向。因此，这句话通常可以理解为“重视顺应民心”。

李世民在这段议论中，采取了正反对比的手法，以说明“贵顺物情”之重要。同样是兴建工程，同样要耗费民力，大禹凿九山、通九河，但百姓并没有怨言；而秦始皇造宫殿、修陵墓，却搞得民怨沸腾。那么，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这是因为，前者是“物情所欲，众所共有”，而后者则是“徇其私欲，不与众共”。就是说，前者顺应了人民的意愿，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而后者只为满足个人的私欲，背离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产生了截

然不同的社会效应。

历代帝王往往过分相信自己的“天纵英明”，迷恋自己的“君权神授”，这种九五之尊、天下一人的心态和地位，使之产生了错觉，似乎只有权力才是一切，以至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段，看起来好像不可一世，然而从历史长河的整个过程来看，个人不过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尘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在社会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盛衰兴亡，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看问题，都是“顺民者兴，逆民者亡”。这从李世民反复提及的秦始皇和隋炀帝那里可以得到明证。

李世民这个思想，在其子孙那里，多多少少还是得到了贯彻，比如李隆基、李昂等等，不然唐代也不可能延续达三百年之久。在这里，尤应一提的是陆贽这个人。唐德宗（李适）建中四年（783年），有一位后来成为丞相并被后世称之为政论家的陆贽先生。有一次，皇上李适问陆贽“以当今切务”，陆贽认为：“当今切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即治，唐代避高宗李治讳，以治为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趋，以靖邦家乎！”陆先生这段话，文字上没有什么生僻之处，可不需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审查群情”、“同其欲恶”等语，都是“贵顺物情”的意思，其主旨也就是要求即使是皇上这种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也要重视人民的意愿。

在这里还有两句作为背景的用语，即“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陆贽在说这话时，其时代背景大致是这样的：由于边臣叛变，京城陷落，致使皇上“乘舆播迁”。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形势，才有这样一种认识吧！历史上的确不乏这样的先例，在生死未卜的创业时期，领导者往往显得开明通达；而在歌舞升平的守成年代，有些领导者往往显得愚昧昏聩。

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

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只有这些问题做好了，才有资格让群众发扬“奉献精神”，树立“大局意识”。只有什么时候将“企业有困难，职工怎么办”，“政府有困难，群众怎么办”这样的口号，颠倒过来，变成“职工有困难，企业怎么办”，“群众有困难，政府怎么办”，并切切实实付之于行动，群众才会真正树立起“大局意识”，发扬“奉献精神”，与各级领导者一起，群策群力，艰苦奋斗，风雨同舟。

“割股啖腹”说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君道》

贞观初年，李世民对臣下说：“作为国君之道，必须先保有百姓。假如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如同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自己的性命也就完了。如果想安定天下，首先要自己行为端正，没有身子正而影子歪、上边得到治理下边反而混乱的。”

“割股啖腹”的故事，最早见于《东周列国志》。晋公子重耳逃亡国外，困乏饥饿。其随员介子推割自己大腿上的肉为重耳的辘辘饥肠解决了一点实际问题。后来重耳作了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介子推的“割股啖腹”是割自己之肉而供他人之腹。与本文所说的“割股啖腹”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本文所指是割己之股供己之腹，带有明显的自残性质。这是就字面理解，另一层不同则是，“割股啖腹”只是一

种比喻,强调了“民为邦本”的辩证关系。

不知是因为版本不同,还是因为传抄有误,不知是因为吴兢(《贞观政要》的作者)功底稍浅,还是因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作者)水平较高,相同或近似的意思,总使人感觉这段论述没有《资治通鉴》中的叙述来得精辟。试录原文如下:“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

在李世民这段话中,实际上蕴涵着“民”、“国”、“君”这样三种概念。尽管在这一点上,《贞观政要》不如《资治通鉴》表现得那么明确,但其原文中的“君”、“百姓”与“天下”三个概念则是与此相应的。李世民这段议论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封建皇帝,首先承认国家是君王之本,而百姓又是国家之本。没有国家当然没有君王,没有百姓也就没有国家。明白了李世民所阐述的这层道理,才能准确地把握他的“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以啖腹”或“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的思想内涵。李世民不是一个历史唯物论者,他当然认识不到民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但他的“刻民以奉君”则“君富而国亡”的观点,仍然闪烁着这位古代政治家素朴的民本主义思想微光。

李世民在对他的“割股啖腹说”作了抽象的概括之后,还进一步作了具体的阐发。在李世民看来,一些官员崇尚奢侈、追求奢华的欲望,大抵是自古而然的。鉴于“刻民以奉君”有可能导致“君富而国亡”的深刻见地,他指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排比递进,凌空而下,直逼骨髓。追求享受的欲望由“刻民”开始,以“丧君”告终,导致这个黑色过程的罪魁祸首正是难填的欲壑。“刻民”必然“损国”,“损国”必然“丧君”,这不仅构成了历代王朝递相兴亡的政治生态链,而且也构成了整个中国史政治周期率的关键环节。周而复始,可悲也夫!

如果说李世民所谓“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政治结构理论,只是民本主义思想之微光的话,那么,在今天,在一个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度里,应当如何看待人民、国家、干部三者之间的关系呢?对于各级领导者